

免社会“板结”。

——在农村地区率先实行12年义务教育。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充足,应在农村率先实行从小学至高中的12年义务教育。这样既可以巩固农村高中的人学率,向大学输送更多合格的农村学生,又能逐步消除城乡教育不公,遏制部分农业大学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滑趋势。

——高校招生名额应向农村倾斜。青岛九中教师姜晓慧说,目前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多集中于发达地区、大城市。一些大学在城市投放了大量的名额,而农村及不发达地区招生的名额很少。未来大学招生政策应当进行调整,将招生名额适当向农村倾斜,以招收更多的农村学生到大学就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根本措施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减免涉农专业学费,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学生的经济支持力度。有专家指出,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资助体系,包括“奖、助、减、免、贷”等多种形式。下一步,可减免涉农专业大学生的全部或部分学费,并发放生活补助或奖学金,进一步加大农村学生的经济支持力度,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给予农村生源高校毕业生更多就业扶持。中国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洋认为,应加强对农村生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支持。如政府承担全部或部分费用对就业困难的农村生源高校毕业生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或者开展优秀农村生源高校毕业生的推介活动,引导群众关注个体的能力和素质,促进就业过程中信息的公开,纠正“找工作就是拼爹、拼关系”等不良风气。(据《新华每日电讯》潘林青 李江涛 潘莹/文)

方早钱也说:“公司每年的品牌推广费、会员费、基建费支出都很大,如果其它景区都按照李坑村的比例分成,公司的确无法承担。”

在采访过程中,有一些村民反映,他们对景区的经营状况不知情,到底赚了多少钱不得而知。村民呼吁,要进一步公开账目,明明白白算账,清清楚楚分成。

在李坑景区,根据村民要求,婺源县派出审计组对门票收入、景区运营成本等进行了全面审计核实。8月3日,审计调查组出具了审计结果,确定了上半年的分红基础。但对于新一轮景区分红事宜,旅游公司与村民仍未达成协议。

业内人士建议,可考虑让村民更多参与景区管理

据了解,除了门票分红问题之外,当地村民对整治违章建筑、改变村民生活习惯等问题也有一些意见。

业内人士认为,在旅游飞速发展的形势面前,村民不断提出的新诉求,需要企业和政府正视。同时,如果旅游公司利益得不到保证,景点投入不足,游客意见增多,也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群众增收、旅游公司盈利、政府受益、游客满意的共赢局面?

婺源县委书记周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婺源旅游从初期的无序发展到组建集团,现在到了景区整体提升的又一个阵痛期。在这个特殊时期,各种矛盾开始集中显现。

婺源县主要负责人表示,在分配利益时,必须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在处理矛盾时,必须“依法依规依合同”,督促旅游公司认真履行合同约定所规定的责任义务,保障各方利益。

业内人士建议,要从根本上解决村民与景区的利益之争,政府部门还应通盘考虑,解决深层次矛盾。比如说,可让更多村民参与景区管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让村民参股,使村民与景区休戚与共,利益共享。(据《人民日报》吴齐强/文)

在拥有药监局发放药品销售许可证的正规药房、有“安全模范药房”称号的正规药店,也发现多种类似违规产品,经有关部门检测,均非法含有西布曲明,他达那非等成分。

管理界定难,监管成为“四不管”的灰色地带? 记者的调查,引起了省、市两级药监部门对此事的高度重视。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宁一表态称,无论仅仅是“见证”,抑或是主动“协调”售假者和打假者私了,都是一个“极其低级的错误”,并已责成杭州市药监局介入调查。而市药监局则明确表示,目前纪委已介入并开展调查,结果出来后,会给媒体、当事人和各方公众一个满意的解释和答复。同时,在上级部门的关注下,江干药监分局也已处于近期向神龙保健品店的实际经营者发出了处罚罚证通知单。

“打假者是药监部门永远的同盟军,也是药监部门稽查办案的重要线索来源。”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处长柳静波说,最近几年市药监局举报投诉中心每年接到的有效投诉均在100起左右,执法人员从这些线索里面发现了一批大案要案。比如去年破获的一起杭州市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生产经营假药案,其重要线索就来自于举报人投诉。

他承认,高敬德举报的这一类假药情况比较普遍,鉴于此类产品在管理和界定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药监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难题。首先是法律法规缺失。关于保健品管理的实施条例迟迟没有出台,类似的保健品应该如何审批,如何生产,如何监管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监管不到位,执法缺少强有力的依据。“这也给我们行政执法部门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惑,要求我们做出行政处罚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就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

分段监管,也导致目前相关的执法主体不够明确。还在田头的农产品由农业部门监管,生产环节归质检,流通环节归工商,到了餐桌上,明确由食药部门监管。俞永明表示,这四段从法律上来讲分得清楚,但往往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有意识地规避法律法规,在部门监管的边界地带钻空子,这也给相关部门的稽查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据《新华每日电讯》张乐/文)

本期聚焦

寒门果真难出贵子?

——透视国内多所农业大学农村生源比例减少

近日,随着我国大学陆续开学,一些人发现今年不少农业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下滑,担负着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的农业大学中,本应具有天然竞争优势的农村学生为何“上不来”?是教育不公还是正常现象?为确保社会各阶层纵向顺畅流动,能否让落后者先跑?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中国农大农村生源首次跌破三成

中国农业大学大一新生小李来自湖北农村,8月中旬便早早来到学校报到。随着新学期开始,他发现班里30余人中仅有不足10人来自农村,这与他预想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农村学生对农业有着天生的感情、丰富的知识和较高实践能力,在农业大学中为何却成了“少数派”?

中国农业大学招办主任周旭峰说,近年来,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今年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

记者了解到,不仅是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等多家农业院校中,近年来农村生源比例也持续下滑,出现农村学生“上不来”现象。

一些农业院校教师和学生表示,由于大学费用较高、就业“轻能力重关系”等问题依然突出,农村生源不仅“上不来”,而且“待不住”、“下不去”。

——“待不住”。相对于农民的收入,目前大学收费过高,因此一些农村学生即便考上大学也

难以负担高额学费。来自山东在平农村一位在读大学生说,他每年学费、住宿费、生活费等各种费用约为1.5万元,父母辛苦耕种10亩土地年收入仅1万元。哪怕不吃不喝也无法支付这些费用,因此过重的经济负担常常让他萌生退学的念头。

——“下不去”。有专家指出,现在大学生就业更多的是“拼爹”、拼社会关系。城市学生,富裕、权贵阶层子弟占据了福利待遇较好的行业和工作,而农村考生甚至上了重点大学也无法获得理想的工作,导致“大学毕业即失业”。

如何看待农村生源减少?

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青岛九中教师姜晓慧认为,目前,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了大多数名师、名校等优质教育资源,而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则相对稀缺。城市学生不仅可以上“名校”,还能够参加各种辅导班、特长班,享受多种加分政策,而这些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却遥不可及。“城里孩上辅导班,农村娃玩泥巴”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因此,部分农村学生没有享受公平教育权利,这导致他们输在了起跑线上,难以考上理想的大学。

还有专家认为,众多大学地处城市,在招生时不可避免地将更多名额分配给了当地,而地处偏远的农村考生获取的入学名额较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此出现国内多所大学包括农业大学农村生源比例减少。

不过,也有专家对此并不认同。“农村学生上

江西婺源景区“闭门拦客”事件调查

分红之争困扰“最美乡村”

在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婺源,李坑、江湾、汪口等景区近日出现了部分村民为争取门票利益而阻拦游客的现象,一些景区因此关闭。

婺源景区为何会出现阻拦游客现象?当地村民与旅游公司又因何产生利益纠葛?为此,记者赴婺源进行了调查。

大多数景区已恢复开放,李坑景区仍关闭

8月28日,记者了解到,目前经过有关方面的调查和调解,江西婺源的大多数景区都已恢复开放,但是李坑景区仍处于关闭状态。

据介绍,在那些经历过关闭风波后重新开放的景区,参观游览人数也比此前有所减少。

一位当地干部说,“风波暂时过去了,但政府、企业、村民之间应该加强沟通,根本问题不处理好,以后难免还会出现类似事件。”

按照通票,婺源景区包含了14个小的景区。在李坑景区,由于新的门票分成协议迟迟未能签订,今年上半年的分成款也没有到位,引起部分村民不满,最终导致了阻拦游客进景区游览的情况发生。

李坑景区的分红之争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要求提高收益分红”的说法下,汪口、江湾景区的一部分村民也做出了阻拦游客进景区游览、上路拦车等行为。

“美景依旧,但感觉怪怪的。”景区出现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慕名而来的游客。记者在婺源采访时遇到了一个来自广东中山的旅游团,导游小王说,因为部分景点不开放,游客心情不太好。“我们买了180元的通票,很多地方进不去,这不是骗人吗?”来自浙江的游客张先生很有意见。

就门票收益分成,旅游公司与村民多次协商未果

村民为何会阻拦游客,并且导致李坑、江湾、汪口等景区关闭?

8月17日,记者来到李坑景区进行采访。在一间办公室里,李坑村民五组组长李喜进说,他们和旅游公司已经谈判十几次了,“全村8个村民小组,每个组都派出了村民代表,镇里的领导也出面了”。

据了解,李坑与江西婺源旅游股份公司需要重新签订门票分成协议,但双方多次协商后却未达成一致。

村民们提出的分红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按比例计算,要求门票收益分成增加到21%。据村民的说法,2001年签订协议时,协议中定下了村民门票分成方式:前10年每年19%,后10年增长到每年21%。“到2011年9月18日,就刚好满10年。”李喜进说,“所以村民的分成就应该按21%计算了”。

另一种是原收益的翻倍计算,每人每年2460元。李喜进解释:“在李坑单点门票还是30元的时候,按照每年19%的比例,村民按户口人头分到的钱已经是每人每年1230元。”

2007年以前,婺源14个景区由多家公司投资经营,各个景区单独收门票。2007年新组建的婺源旅游股份公司取代原来的投资者,成为李坑和其他13个景区的统一经营者。有村民认为,“李坑的门票从30元一下子涨到60元,给村民的钱也应该翻倍”。

关于分成比例的问题,江西婺源旅游股份公

司总裁方早钱表示仍在与村民进行沟通和谈判。

他分析,在开发旅游初期,村民对古村落旅游的希望值不高。但随着旅游的快速发展,村民对收益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原有的门票分成与旅游快速发展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导致了矛盾的产生。

据介绍,2001年婺源景区仅有三四万的游客量,到2010年,游客总量超过530万人次。这期间,村民与旅游公司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不断,而现在因为收益分成合同引起的矛盾开始集中爆发。

村民称,对景区的经营状况不知情,要求审计、公示账目

记者了解到,旅游公司与各个景区村民所签订的收益分成合同并不相同。在江湾和汪口景区,一些村民指出,李坑的村民每人每年能领到上千元的分红,为何他们每年仅领150元?钱都到哪里去了?

对此,婺源县常委、江湾镇党委书记俞春旺解释说,因历史原因,根据村民签订的合同,江湾、汪口景区分红机制有别于李坑。

以江湾景区为例,因大部分为新建景点,投资超过3000多万元,2004年景区一度难以续。

俞春旺说,当时曾经征求村民意见,到底是引进旅游公司承包、村民分红,还是村民参股或者由村民将景区承包下来。结果85%的村民选择了每年分红100元。随着景区发展,现在每年分红已增加到150元。

他说,合同目前尚未到期。根据合同与江湾景区实际,分红标准不可能调整到与李坑村一样。

一位职业药品打假人的困惑

在职业药品打假人高敬德看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直是他坚实可靠的同盟军。然而,手持着盖有药监局公章的《协商意见》,高敬德彻底懵了:药监部门竟然和售假者站到了一起,撮合其“协商解决”。

执法者为何成为售假者私了的见证人乃至帮凶? 见证“私了”,是工作失误还是售假者帮凶? 为督促药监部门尽快处理其两年前的一起举报,今年6月23日,家住上海的高敬德专程来到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干分局。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具体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却打电话喊来了售假者,并起草了一份《协商意见》。

这份《意见》白纸黑字写明:高敬德与神龙保健品商店就高敬德向药监部门投诉举报该店销售的嬉春丸等五种产品,达成一次性赔偿意见。该店向高敬德赔偿购买产品价格10倍的赔款计1200元;高敬德领取举报奖励4300元;高敬德放弃包括投诉举报、诉讼、行政复议、向媒体曝光等在内的各种形式就本案追究神龙保健品店和药监部门的责任。除了高敬德和售假机构在《协商意见》上签字外,江干分局还在协议上加盖了公章“以做见证”。

高敬德告诉记者,这份协议是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敲出来的。同时,药监部门还要求自己在签署协商意见之后,放弃一切追究药监部门责任的权利。随后,神龙保健品店向他支付了1200元赔款和本该由药监部门支付的4300元举报奖励费。

江干分局局长莫清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分局的确在这份《协商意见》上盖了章,此举是希望为双方做个调解的见证。她承认4300元是由保健品店支付的,但写成“举报奖励费”是高敬德的授意。至于协议为何是由工作人员起草,是因为高敬德的手此前受过伤不方便”。关于放弃

追究药监部门责任的表述,则是高敬德和保健品店的要求。

然而事实上,早在5月15日,记者就曾目睹高敬德和江干药监分局某科长的一次通话。高敬德说,该科长告诉他局里认定的案值大概是两万多元,并告诉他可以叫卖假药的人一起过来协商解决,把案件了结。“科长还劝我说,如果我坚持要处罚,相对人一跑,到时就什么赔偿和奖金都拿不到了。”高敬德挂完电话之后百思不得其解,“药监局是执法者,为什么却反过来了成了售假者的帮凶?”

然而,当记者就此事向莫清兰求证时,她却自始至终认为,盖章和作见证的做法虽然欠妥,但仅仅是工作人员“工作细节上的问题”。当时出发点是在依法行政的同时,妥善化解矛盾”,并不涉及渎职,更谈不上做售假者的帮凶。

两年未结案,是不作为还是执法难到位?

今年43岁的高敬德曾在上海的一家医药公司任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意外服用了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的假药,随后走上了专业打假的道路。

2009年11月和12月,高敬德先后六次向药监部门举报,位于杭州天城路的神龙保健品商店销售的阿拉伯拉伟哥、澳洲袋鼠、嬉春丸、苍蝇水、阳痿早泄克星等保健类产品涉嫌非药品冒充药品销售。随后,药监部门分别在11月20日和12月2日,现场查获了以上五种产品,并进行了先行登记保存。记者在调看了由药监部门确认的上述五种产品的外包装印件后发现,这五种产品外包装印刷粗劣、暗示或明示含有性兴奋、防止早泄、迷幻、催情等物或违禁成分,几乎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假药或问题产品。

然而,虽然高敬德此后多次催促询问,却一直没有接到药监部门的处理结果。对此,江干药

监分局的答复是:“我们一直在进行调查。”

莫清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敬德举报的这类产品是一种边缘产品,定性非常难。仅从这些产品的批文而言,既有食字号、健字号,又有消字号、妆字号,他们的审批和管理涉及质监、工商、卫生等多个部门,“要核实,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

在该局提供的一份“案件办理进程表”上,记者看到,早在2010年3月下旬,药监部门即已完成该案的调查取证工作和调查终结报告。但之后又认为,仅以外包装明示暗示药品疗效的证据对案件定性,理由证据不充分。“为了将案件办成铁案,我们决定对涉嫌产品送检,以确保假药的定性更加准确;同时,向外地药监部门发函进行产品核查,加强假冒产品证据收集。”莫清兰说。

从2010年11月起,江干分局陆续收到了杭州市药检局出具的检测报告,确认除苍蝇水外,其余四种产品均被检出含有西地那非和他达那非等违禁药物。同时,拉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明确回函称,苍蝇水和阳痿早泄克星两种产品标识的生产企业和批号并不存在。

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俞永明告诉记者,为整治类似行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0年5月开展了一项为期两年的“整治非药品冒充药品专项行动”,与此配套出台的文件将这些似是而非的产品纳入了整治的范围。“也就是说,非药品冒充药品,包括一些保健品里面添加了药物成分,都可以以假药论处。”

关于高敬德举报案件的调查本可到此终结,可事实并非如此。2011年5月,高敬德被告知方便时到杭州和保健品店“协商解决”。

高敬德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失职行为,正因为药监部门监管不力,甚至包庇纵容,才导致其辖区内假药泛滥。此后,记者曾多次跟随高敬德前往该辖区暗访,并多次买到类似假药。甚至